

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

葛晓音

千百年来，杜甫一直被历代封建文人推为“一饭不忘君恩”（苏轼语）的楷模，这就在现代人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杜甫对封建君王的抗争精神不如李白那么强烈。通读了杜诗全集之后，我觉得杜甫对君臣关系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如果说李白是以他笑傲王侯、戏谑万乘的狂气体现了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精神的话，那么杜甫则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和动乱不息的社会现实中经过反复深沉的思索看清了封建君臣之间的不合理关系。

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和大多数盛唐文人一样，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看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是建立在君为中心、臣为附庸的观念以及对玄宗这个“尧舜之君”满怀信心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正如杜甫《南郊赋》所说：“九五之后，人人自以为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禹。”即使在天宝后期社会政治日趋黑暗的形势下，象李白、杜甫这些对现实认识比较清醒的诗人也仍然存在着希望玄宗更新政治的幻想。杜甫曾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因而当他揭露社会黑暗的时候，也就难免对君有所回护，将政治弊病都归结于臣的失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在杜甫早年的思想中，“明主”确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杜甫奔赴行在，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即因房琯事件而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这场斗争在杜甫心目中抹去了最高统治者头上的光圈，对他的君臣观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钱谦益在杜甫《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和《送贾阁老出汝州》二诗的笺注中曾提到天宝十五载八月玄宗幸普安郡，房琯建议“制置天下之诏”是他被贬的真实原因，并认为“肃宗深忌蜀郡旧臣”，故房党严武、贾至等“联翩而去”。傅璇琮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贾至考》中又进一步指出这次事件反映了肃宗与玄宗及诸皇子之间的复杂矛盾，随玄宗赴蜀的旧臣和随肃宗在灵武的新贵之间的矛盾，这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如果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挖掘，还可以发现杜甫被贬的更直接的政治背景。至德元载（即天宝十五载）十月贺兰进明在肃宗面前进谗，谓“（房）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颖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为圣皇制置天下，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上由是恶琯。”（见《通鉴》卷二一九及《旧唐书·房琯传》）同月，房琯与安禄山叛军战于陈陶斜，官军惨败。如果此时借机罢免房琯，正好名正言顺，但经李泌营救，肃宗“乃宥之，待琯如初”，反而在至德二载五月因小小的董庭兰事件罢去房琯相位。罢相后又不立即贬出，直到次年（即乾元元年）六月才放到外州。杜甫救房琯得罪后，经张镐营救仍为左拾遗，也是在过了一年太平日子之后才因房党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显然，普安郡倡制置之说虽是房琯被肃宗疏远的主要原因，但直接造成他的罢相以及贬谪的具体背景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我认为至德二载房琯罢相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璘起兵，次年二月兵败，这才引起了肃宗一连串地罢免蜀郡旧臣的行动。首当其冲遭到打击的是韦见素和裴冕，他们在三月里同时被罢知政事（见《通鉴》卷二一九及肃宗本纪）。韦见素是从玄宗入蜀的唯一朝臣，裴冕本是劝肃宗在灵武即位的功臣，他的被贬，当与他是普安郡诏上的头一名宰相有关^①。韦、裴被罢，肃宗立即起用曾在安禄山叛乱初起时触犯过玄宗的苗晋卿^②为相。五月，房琯被罢为太子少师。八月，宰相崔涣被贬为余杭太守。这几个人都是玄宗从蜀郡派来的重臣^③。《旧唐书·韦见素传》说：“及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元知政事者。”已点出这次罢相的实质，不过说得笼统一些，房琯并非以败军左降，崔圆罢相在乾元元年五月，不在这次之列。普安郡诏中的旧臣没有遭贬反而提升的也有，如李岷，他在永王璘进兵江南时辞疾赴行在告密，因而受到肃宗的褒奖，封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④。肃宗先拿韦、裴、房、崔四个宰臣开刀，又提升苗晋卿和李岷，不难看出，其贬擢的真实用意是在向玄宗做出一种姿态，表示他对玄宗所制普安郡诏的否定，以发泄其对于“天子遥分龙虎旗”（李白《永王东巡歌》），派永王璘出镇东南的恼怒。杜甫疏救房琯说“罪细不宜免大臣”，正好触到肃宗的隐痛，因而使肃宗恼羞成怒，以致于救人的罪比被救者本人的罪还要重，竟至要把杜甫送交三司推问，恐怕其奥妙也正在此处吧！杜甫被赦后虽仍得以继续供左拾遗之职，但这次事件已经使他开始懂得君王也会有过失，并不象他以前所想的那么神圣：“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这与他在《赴奉先咏怀》诗中为君辩护的态度已略有不同。

乾元元年五至六月，肃宗又一次大规模罢免蜀郡旧臣，房琯、刘秩、严武、贾至、杜甫同时被贬，张镐、李麟、崔圆也被罢知政事。张、李二人的被贬固然都与李辅国有关^⑤，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张镐是玄宗旧臣^⑥，李麟是玄宗留在蜀都行在总摄百司的宠信，随玄宗还京后，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见《旧唐书·李麟传》）。这次事件的背景更为复杂，除了蜀郡旧臣与李辅国等新贵之间的矛盾以外，最值得重视的还是玄宗于至德二载十二月还京之事在不同政治集团中间所引起的心理反映。虽然玄宗已退居太上皇的地位，但这个五十年的太平天子在朝野还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当他回到长安时，“父老在杖外，欢呼且拜。上令开杖，纵千余人入谒上皇”（《通鉴》卷二二〇）。杜甫《收京》其一说：“仙杖离丹极，妖星带玉除。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暂屈汾阳驾，聊飞燕将书。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正反映了人们盼望玄宗改弦更张、重亲政事、再致太平的普遍心情。玄宗回京后，虽然朝廷对蜀郡、灵武功臣策勋行赏，待遇相同。但蜀郡旧臣并不满足于赏赐的空名，而要争取实际的权势。房琯家“朝夕宾客盈门”，其党为之扬言“琯有文武才，宜大用”（见本传），正是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的怀旧情绪的反映。这种政治情绪对于唐王室这样一个多次发生过宫廷政变的统治集团来说具有什么意义，肃宗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何况玄宗还不是一个自甘寂寞的太上皇，对于有些政事，他还要参与过问。而一向以孝谨著称的肃宗为了给玄宗以表面上的尊重，又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如《通鉴》卷二二〇载肃宗竭力为张均张垍请求免死，“玄宗答曰：‘张垍为汝长流岭表，张均必不可活，汝勿更救！’上泣而从命。”玄宗住在兴庆宫时，“父老过者往往瞻拜，呼万岁”。玄宗也曾邀请过一些大臣如郭英义、剑南奏事官等上楼赐宴。后来上元年间李辅国之所以敢于以“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为理由，擅自用武力将玄宗移到西内，正是因为他猜透了肃宗无法明言

的心事。由于肃宗十分清楚房琯等怀念玄宗的情绪代表了一种相当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具有潜在的威胁，这才引起了乾元元年六月大规模排斥蜀郡旧臣的事件。杜甫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两次受到牵连，成为最高统治者之间勾心斗角的牺牲品，这不能不促使他认真地思考这种斗争的实质。他在被贬赴华州途中见到华山时，不禁触景生情，激愤地说：

“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望岳》）从字面看，好象只是咏西岳之景，要等秋凉以后来此寻仙访道。其实更深一层的含义则是隐喻自己此去华州再无重回长安的归路，通天虽有一门，途中却箭栝森列，无法攀登，等这一阵政治迫害的热潮稍稍冷却之后，定当寻找时机把皇帝贬斥自己的真正根源问个清楚。残酷的政治斗争破除了杜甫对肃宗的崇信：“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其二十）这尖锐的讽刺说明杜甫的君臣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代宗登基以后，翻了一些肃宗时所立的旧案，永王璘等都得以昭雪。房琯、严武、贾至、等旧臣也得以起用。杜甫来往于梓州阆州之时，送别诗特多，说明当时正处于新旧势力的交替之中。杜甫见许多故人纷纷回京，当然不免动心：“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得房公池鹅》）但不久朝廷任命他为京兆功曹，他却不去赴任，反而准备出川东下，其原因当是多方面的。这时房琯已死，杜甫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和挚友。同时他认为如今已是武功取将相的时代：“王室比多难，高官皆武臣。”（《送陵州路使君之任》）文人儒士在无休止的战乱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飏风尘际，何地置老夫？”（《草堂》）由于朝廷信任宦官，猜忌顺从朝命的功臣，姑息横行不法的武夫，图谋割据的野心家越来越多。代宗复旧的某些措施并不能抵消杜甫对现实更深刻的失望。他明白自己就是重回朝中，也无法与那些龙争虎斗的野心家们和平共处，更谈不上制服他们：“伏柱闻周史，乘槎有汉臣。鸬鹚不易狎，龙虎未宜驯。”因此他决定不赴功曹，而是尽自己所能勉励朋友们为国除害立功，不要尸位素餐：“列国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闻除猘獠，休作画麒麟。”（《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杜甫不赴功曹说明他对个人出处的问题已看得比早年豁达多了。但这种豁达实际上意味着他对当今皇帝的幻想已经破灭，因而其悲剧意义更为深刻。当初他曾寄希望于肃宗：“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此时他却以极其不恭的口气讽刺肃宗：“郾城反复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虑补四方。”诗人对于代宗的昏庸无能更是愤慨：“庙算高难测，天忧实在兹！”（《夔府书怀四十韵》）他批评皇帝不肯起用贤者，也不能惩罚奸佞：“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伤春》）并且尖锐地指出：“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休传鹿是马，莫信鸛如鸱。”（《奉赠卢五丈参谋珪》）天子的恩泽虽多，百姓的灾难却愈益深重，指鹿为马的奸臣固然可恶，但信鹿为马的天子更是昏愚。诗人还从叛乱四起的政治形势中认识到君对臣的猜忌是导致臣心叛离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在《八哀诗》中对因“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因愧耻成疾”而死的李光弼特别致以深切的哀悼。如以封建的臣节观念衡量，李光弼比不上与他同时的郭子仪，但杜甫不但没有对此加以谴责，反而满腔热情地讴歌了李光弼匡复社稷的功绩，对他遭忌而死的不幸结局倾注了极大的同情：“青蝇纷营营，风雨秋一叶。内省未入朝，死泪终映睫。大屋去高栋，长城如遗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并且表示相信“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筐篋”，李光弼的冤屈总会有直笔的史臣，不怕得罪皇帝，为他洗清的。

现实使杜甫早年以君为太阳、臣为葵藿的观念转变为君臣遇合的理论，他主张贤人可以看君是否能与自己相合而决定进退：“古来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贤人识定分，进退固其宜。”（《述古》其一）要想太平，必须君臣共同努力重修德政：“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伤春》）。《谒先主庙》赞美先主、武侯、关张君臣契合，叹息当今没有能用贤臣的明君：“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应天才不小，得士能契邻。迟暮堪帷幄，飘零且钓缗。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周甸注此诗说：“必有真主应天之才，方成君臣契合之机。”颇得诗人用心。《古柏行》说：“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志士仁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也仍然是叹息有臣无君，故材大难为其用。这种思想虽然从根本上说并未摆脱臣为君用的封建伦理观念，但其批评的主要矛头却是指向当时君的无能昏庸。特别是在《牵牛织女》一诗中，杜甫明确地抨击了封建君臣关系的不合理：“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虽无舅姑事，敢昧织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义无弃礼法，恩始夫妇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一作“勿替丈夫雄”）。”诗人以夫妇关系喻君臣关系，嗟叹为人之妻犹如为臣之人，忧心忡忡，严于律己，竭力为君效劳，不敢有所懈怠。君臣之间明明十分契合，但咫尺之间臣就不能为君所容。夫妇、君臣关系都应当遵守礼法，出于至公，互相信任，有始有终。但是实际上每当发生矛盾，霸道的总是夫君，受气的总是女子和臣子。（一作“勿替丈夫雄”，则此意更明确：如夫妇、君臣不和，不应当总是偏袒夫君一方。）诗人虽然不可能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礼法”本身的实质就决定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但实际已有所感受。这种认识是从他一生的坎坷遭遇和现实政治的无数不合理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与他头脑中儒家宗法礼教的理念显然发生了矛盾。正因如此，这首诗便遭到许多封建道学先生的歪曲，如罗大经说：“朱文公尝病《女戒》鄙浅，欲别集古语成一书。……且言‘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静。”仇注谓“盖夫妇之道，通于君臣，臣一失节，则君将不容矣。妇一失身，则夫将见绝矣。……故以夫女人伦之道讽谕世人。君臣句，特比语耳。”这就用封建伦理纲常的教条掩盖了这首诗的真正倾向和明显的锋芒。当然，面对藩镇割据已初步形成的复杂形势，杜甫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他更多的诗是要求武臣忠于朝廷、报效天子，维护国家的统一。杜甫所谓忠于天子在实际上已经与忠于国家的观念混为一体，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出于对昏君庸主的失望以及对贤君明主的向往，将君臣鱼水契合的标准统一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① 晋安郡诏文说：“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通鉴》卷二一八）② 《旧唐书·苗晋卿传》：“属禄山叛逆，杨国忠以晋卿有时望，将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镇遏东道。’遂出为陕州刺史、陕虢两州防御使。及入对，固辞老病，由是忤旨，改宪部尚书致仕。”③ 《通鉴》卷二一八：“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涣迎谒。上皇与语，悦之，房琯复荐之。即日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韦见素为左相。”“己亥，上皇临轩，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④ 《旧唐书·李峴传》：“至德二载十二月制曰：‘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李峴，懷军周给，开物成务，可光禄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可见江陵刺史李峴从永王处赴行在不久，便得了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的官赏。”⑤ 《旧唐书·李麟传》：“唯麟正身谨事，无所依附，辅国不悦。乾元元年，罢麟知政事。”⑥ 《旧唐书·张镐传》：“数月，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